

长篇历史小说

建军大业

关河五十州 著

建军大业

关河五十州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军大业 / 关河五十州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39-4885-6

I. ①建…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9217号

责任编辑 许龙桃

金荣良

装帧设计 钟 蓉

建军大业

关河五十州 著

-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 网址 www.zjwycbs.cn
-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660mm×960mm 1/16
- 字数 379千字
- 印张 24.75
- 印数 1-15,000
- 插页 2
-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339-4885-6
-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力量大似天	001
第二章	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	040
第三章	敌人打进来了	076
第四章	开辟自己的路	114
第五章	当年烽炬传千里	150
第六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	190
第七章	要做失败的英雄	231
第八章	被惊醒的巨兽	264
第九章	最是橙黄橘绿时	307
第十章	漫山遍野通通明	342

第一章 力量大似天

1927年3月21日上午，中共江浙区委秘书夏之栩像往常一样，前去参加区委每天召开的碰头会。路上她碰到了自己的爱人、同去开会的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赵世炎兴冲冲地对她说：“快点走，有好消息！”

果然，在随后的会议上，区委书记罗亦农宣布：北伐军已于前一天晚上进抵龙华，上海工人今天要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

大家听了都振奋不已，散会后，立即分头回去布置行动。

分手时，赵世炎特意提醒夏之栩，让她赶快回宿舍一趟，通知“夏娘娘”（夏之栩的母亲）：“我们今晚都不能回去，战斗何时结束何时回家，免得她老人家记挂！”

说完，赵世炎就直奔闸北总指挥部。在即将开始的武装起义中，他必须在前线直接指挥作战。

提起赵世炎，早期赴欧学习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不佩服的。聂荣臻由衷地说：“我们都很崇拜他。”蔡畅称赞：“世炎和恩来全身都是聪明。”邓小平则指出旅欧时期革命组织的领导者，第一是赵世炎，第二是周恩来。事实上，赵世炎在法国时任少共（即中国少年共产党）总书记，地位确实在周恩来之上。

不能不承认，人的天分是有差别的。比如一起到莫斯科留学，同样的时

间，有的人只能说几句日常用的俄语，俄语演说和讲课根本就听不懂，而有的人却能将俄语说到和苏联人一样溜。

赵世炎属于后者。有一年他随李大钊出席苏联大使馆召开的纪念会，会上有好几位不同国籍的外国友人登台讲话，赵世炎即席上场，一连担任了俄、英、法三种语言的翻译！

当时做翻译不是事先拟好翻译稿，照稿宣读，而是人家讲一段，要紧接着翻一段。赵世炎边听边记，不但翻译用词清楚，而且语调生动有力，听起来他好像不是在为别人翻译，倒像是自己在做报告。与会者目睹此景，无不为之赵世炎的才华所惊叹。

革命家

那个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常常爱把赵世炎拿来和周恩来比，当然是因为两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的情商和智商都相当高，聂荣臻回忆旅欧时期的赵世炎，说：“接触过他（指赵世炎）的，不管男女老幼都同他合得来。”

人的性格脾气千差万别，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只要跟赵世炎打过交道的，都能和他成为朋友，甚至你只要和他接触过一次，赵世炎就能在你心目中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

赵世炎在北方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位同志前去找他。双方之前从未谋面，然而令这位同志意想不到的，当晚一开始的气氛竟然就像老熟人重聚一样。

在聊家常一般地问过对方的情况后，赵世炎说：“革命是伟大的事业，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艰苦，需要奋斗……”

当晚赵世炎的话并不多，可是却已深深地打动了谈话者，让他坚定地相信赵世炎“是为革命而生，也会为革命而死”。

赵世炎身为中共北方区领导人，却从不仗势压人，对部下、同事交代工作和解释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解说，有时即便他已经做了决定，还是

会拍拍接受任务者的肩膀，用亲热的口吻问道：“老弟，你看如何？”

在平时的工作中，赵世炎对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极其周到，毫不马虎，常说的一句话是：“有时候小问题和大问题同样重要。”

有一次他到沪西开会，会后与沪西区工会负责人陈钧同行。陈钧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一般人不会注意这样的细节，但赵世炎注意到了，他马上让陈钧把报纸收起来，因为在他看来，“这容易暴露身份，普通的市民是不会这样关心时事的”。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所养成的习惯。为了适应危机四伏的秘密工作环境，赵世炎要经常变换自己的装束，他有时身穿褐色学生装或长袍马褂，拿一根手杖，脖子上还围一条白绸围巾，装扮得和普通学生无异，但有时又穿得西装革履，很像一个刚刚出洋归来的留学生。

赵世炎行动机敏有急智。地下党称敌人的暗探为“泥巴”，最初大家对甩“泥巴”都缺乏经验，赵世炎在这方面则是个高手。他和大家一起开会，散会后总是笑着说：“我先走，把‘泥巴’带走，免得麻烦你们。”

赵世炎还是个“工作狂”式革命家，除去工作，没有别的任何爱好，尤其工作繁忙时，他的脑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几乎是不停歇的。

赵世炎一天里的睡眠时间很少，但差不多一睡下就滔滔不绝地说梦话，不是做政治报告，就是辩论问题。某日，他白天做了一个报告，有人听后提出了不同意见，赵世炎记在心里，晚上说梦话时又重新做了一个报告，并且在报告中对不同意见做出了回应。

众人见状都很感动，第二天便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晚上的报告比白天好！”

江浙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按照一位当事人提供的说法，中共在上海的工作曾经非常薄弱，几任领导都因能力不足或被降级或自动离职。直到罗亦农从北方调来上海，上海的工作才走上正轨，其后随着赵世炎来沪并出任区委组织部长，上海的工作变得更加有声有色，逐渐步入了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赵世炎的长项之一是搞工运，组织工人罢工。上海工人一开始对参加罢工并不是都很积极，有一个工厂的工人就说：“阿拉工人命不好，再出头不

过是个‘土’，只有死了，埋在土里，才能出头。”

赵世炎很懂得工人的心理，立即加以引导：“‘工’和‘人’加在一起就是天，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大似天。”他还拿纺织厂的线打比方：“一根线可以拉断，但是把线扭成绳子，织成布就拉不断。”

经过赵世炎的努力，这个厂很快就建立起了工会组织和纠察队。

在大革命时期，赵世炎化名施英，那个时候在上海，很少有工人或市民不知道“施英”的。罗亦农对赵世炎的才干也非常认可，曾经评价说：“世炎能煽动，能工运。”

根据区委分工，罗亦农主抓全面工作，工人运动由赵世炎、汪寿华负责，其中由赵世炎裁决重大问题，汪寿华主要处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事务。

在“罗赵汪”三驾马车的驱动下，共产党在上海终于成为了一支各方都不敢忽视的政治力量。

没有起义的起义

大革命时代的起义也被报章称为暴动，暴动一词据说最早出处还是来自孙传芳。

在孙传芳崭露头角之前，北洋军阀共有两大派系，分别为吴佩孚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孙传芳原属直系，任浙江督军。1925年秋，他托名“秋操”（即秋季的军事演习），对控制江苏和上海的奉军实施突袭，之后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斗，就将奉军驱出了南方。

孙传芳至此据有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同时他也从直系中分化出来，建立了北洋军阀内部除直奉两系之外的另一重要派系。

这一事件曾引起共产党人的极大关注。张国焘提议说：“下次上海发生战争，我们应有准备，把败退士兵的枪械缴下来，自己武装，再同得胜的军阀说话。”

当时国共合作不久，北伐也尚未启动，所以包括张国焘在内，谁都没有

想到这个“下次”已经是北伐军和北洋军之间的战争了。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入江西，孙传芳急忙把主力部队调至江西战场，上海守备空虚，这就为国共同时创造了一个趁机予以夺取的天赐良机。受广东国民政府的委派，国民党代表钮永建首先赶到杭州，与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省长夏超秘密谈判，将夏超争取了过来。

10月中旬，夏超看到孙传芳在江西屡屡败北，便在杭州公开宣布独立，归附国民政府。这时国共也已达成初步协议，决定里应外合，联合在上海发动起义。

按照各方事先商定的计划，夏超将进兵上海。一俟夏军逼近上海，共产党方面即以工人纠察队为基干，会同国民党方面的便衣队和商团，对上海驻军实施袭击，然后占领上海。

可是在后期直系中有悍将之称的孙传芳却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对夏超早有戒心。夏超派往上海的警备队刚到嘉兴，就败给了孙传芳从长江两岸调来的军队。孙军乘胜追击，又占领了浙江，不久连夏超本人也被打死了。

由于通信条件较差，江浙区委未能及时得知夏超溃败的消息。钮永建虽然知道，却又寄望于通过暗中游说的方式，让上海驻军将领效仿夏超，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一消息马上告诉联合起义指挥部，只是说时机不成熟，要推迟起义。

这个时候上海滩纷传北伐军已攻克九江（实际北伐军攻克九江还是半个月后的事）。九江既下，就可对南昌实施包围，说明江西战事结束在即，孙传芳已经输定了。江浙区委据此信心倍增，由赵世炎领导的准备工作也没有因为国民党方面不赞成而中止。

准备期间，赵世炎组织了两千工人纠察队员，但武器很少，没枪的人只好带一把斧头。直至10月23日，原计划中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应江浙区委的要求，钮永建才从他的经费中拿出一万元，从黑市上为纠察队买了一百支毛瑟枪。

纠察队固然力量较弱，然而当时上海的孙部驻军也仅有警察两千、步兵一千，这让江浙区委多少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冒险发动一下，再加上夏超兵临城下，就可以迫使驻军归降或溃败。

当晚，罗亦农在钮永建的寓所客厅里与之谈判。到了下半夜，远处忽然传来炮声，把客厅的玻璃窗都给震动了，钮永建的脸色顿时一变。

原来，停在黄浦江的两艘小型军舰已为钮永建所策动，按照原来的方案，军舰会先开炮，以炮声作为起义的信号。可是后来钮永建又主张推迟起义，自然军舰到时就不开炮了，令他没想到的是，军舰上有个下级军官被地下党说服了，这名军官执行江浙区委的命令，在预定时间过后，仍然偷偷地开了炮。

即便不问，钮永建也知道是罗亦农他们搞出来的，于是连声责怪罗亦农，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预先通知他。到了此时，罗亦农才从钮永建嘴里得知夏超溃败的消息。

几乎在同一时间，赵世炎也从铁路工人那里打听到了这一消息。一时间，大家都急了，几个区委负责人亲自跑往各区，分头通知纠察队停止起义。

却说工人纠察队一直在指定地点待命，等的就是军舰开炮，但一等再等，等到下半夜两点多，预定起义的时间早过了，还是没有听到炮声。有人等得不耐烦，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了出去。

在区委下达停止起义的命令后，离区委较近的闸北立即停止了行动，但离区委较远的浦东和南市早已行动起来，根本来不及制止。

其实在起义前夕，上海工人要发动起义的消息也已经严重泄密，军警早就有了准备，部分纠察队员冲出去不久，便遭到反击，至第二天凌晨，这次实际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的起义以失败告终。

一心三用

在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有百余名工人被捕，十余人牺牲。报纸详细登载了牺牲者被捕、审判和就义的经过，牺牲者当中的共产党员都说自己是国民党员。这是因为自从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便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对外也以国民党的政治面貌出现。

这一情况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反思。瞿秋白看报后感慨地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

作为起义的具体领导者，赵世炎对此更为痛心，试想一下，若是钮永建不藏着瞒着，早一点把夏超溃败的消息告诉区委，区委又何至于冒着风险贸然发动起义，乃至蒙受如此大的损失？

在区委会议上，赵世炎承认“我们不免太幼稚”，作为教训，他提出以后不应对国民党过度依赖，“对钮永建的继续关系要减少，要以秘密的方式对付他，不要像这次专受他的最后决定”。

与此同时，他也检讨起义准备期太短以及发动不够等问题，认为即便夏超不溃败，从“浅薄的准备”和“时机的错误”上看，起义仍难以取得成功，或即便一时成功亦难以支持太久。

知耻而后勇，赵世炎又进一步给自己上紧了发条，成了“超级工作狂”。他日夜奔走、开会、写文章、调查研究、个别谈话，每天都忙个不停，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夏之栩经常在半夜醒来，还看到丈夫在灯下写东西。有时，赵世炎甚至一连几天都不眠不休，实在累得不行，就利用开会前等人的时间休息几分钟，人员一到齐，便又揉揉眼睛，重新开始工作。

赵世炎原本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但这样超负荷地连轴转，纵使铁打的金刚也会感到吃不消。为此，他除了在工作中用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来提神外，还常常同时进行几项工作。

上海工人史照华第一次见到赵世炎时，他正在和罗亦农、汪寿华讨论问题。史照华看到他一边嘴上说着，一边手上还在不停地写文章，同时又在听取一个关于铁路工运的情况汇报。

古人说，一心不能二用，赵世炎是“一心三用”，而且在短短的时间里，他竟然把来自不同方面的几个问题都圆满解决了。这让史照华感到十分惊讶，觉得赵世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其他人亦有同感，说：“施英同志（赵世炎的化名）真了不起，他在同一个时间能做三件事。”

至1927年1月，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组织已达一百八十七个，比上年9月增加了一倍，会员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总工会还增设了经济斗争部和

纠察总指挥部，后者主要用于加强对纠察队的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的地点一般都设在工厂附近的荒地上，为了掩人耳目，白天不进行操练，只利用晚上秘密进行。各纠察队有枪的直接练习射击，暂时没枪的就拿着用竹头做成的刀枪，练习立正、稍息和一些简单的列队动作。

赵世炎本人在莫斯科受过军训，有一定军事基础，他只要一有空，就会在深夜里悄悄地来到秘密训练点，亲自教授工人如何射击和组织战斗队形。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攻占杭州，第二天其前锋到达嘉兴，直逼上海。孙传芳的势力已成风中之烛，他被迫与过去的老冤家奉系讲和，并打算率部撤到苏北，将沪宁一线地盘交给张宗昌的奉鲁联军接管。

就在孙军正在退走，奉、鲁军尚未到达之际，江浙区委在上海发动了总同盟罢工，2月19日，上海总工会的总罢工令一发出，就得到十五万工人的呼应，至第四天，罢工人数已增至三十六万。整个上海迅速陷入瘫痪，就连平时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也因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门停营，显得十分冷清。

上海警备司令李宝章原为孙传芳手下的一名旅长，因镇压夏超以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功”，才得以坐上了新交椅，没承想屁股尚未坐热，就被将了一军，顿时怒火中烧。他当即派出大刀队到各处沿街巡逻，这些大刀队每十多人为一小队，队前有一人手里高举令箭，其余每人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只要见到发传单或喊口号的人，就当街砍杀。

某次，一些人在戏院门口看上演剧目的说明书，大刀队误认为他们是在阅读革命传单，冲上去便挥刀乱砍，结果当场砍死砍伤多人。浦东有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口呼“卖大饼”，大刀队说他是在喊“打败兵”的口号，上去一刀就给戳死了。

大刀队杀了人还不准收尸，名曰“暴尸示众”。当时仅仅在闸北火车站附近的电线杆上，便挂了好几颗血淋淋的脑袋，上海街头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行人见之莫不色变。

李宝章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措施大大激怒了上海民众。从总罢工的第二天起，就不断发生工人向军警夺取武器的事件，总同盟罢工在第三天也开始转为武装起义。

绝不是失败

相比于第一次武装起义，赵世炎这次准备得应该说比较充分。他曾专门派纱厂女工、共产党员朱英如侦察敌情，并且告诉朱英如具体应该如何侦察：不要一本正经，要故意装扮成一个浪荡的女人，脚上穿拖鞋，嘴上叼香烟那种。

朱英如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就向赵世炎报告。赵世炎听后仍觉得侦察得不够细致，他除替朱英如纠正拿香烟的姿势外，又再次派她到各处打探动静。

这时海军的“建威”“建康”号军舰正停泊于黄浦江上。和第一次起义时一样，海军士兵中也发展了地下党员，赵世炎派人送信给他们，让他们到时首先控制军舰的指挥权，然后开炮轰击上海的重要军事目标，以炮声作为起义的信号。

汪寿华看到了信，认为海军里面的地下党要完成规定任务十分不易，有掉脑袋的危险。他对赵世炎说：“这个命令是催命的文书，成功了是英雄，不成功这些同志的命就完啦。”

赵世炎的态度很坚决果断：“革命嘛，就是这样，要么我们革了敌人的命，要么敌人革了我们的头！”

1927年2月22日晚，“建威”“建康”依约开炮，看上去似乎挺顺利，没有出什么岔子，可是接下来就不行了。

按照起义计划，海军起义士兵应在军舰上准备好枪械，由浦东的工人纠察队派汽船去取，浦东纠察队拿到枪械后，再过江与其他纠察队会合。起义开始后，汽船却并未能够按原定时间开出，浦东纠察队以为计划有变，大部分人都离开了码头，等到汽船姗姗来迟，已于事无补。

在缺少浦东纠察队参与的情况下，其他纠察队没有占领兵工厂等要害部门的足够力量，只能分散地袭击地方警察署。其中负责攻打飞虹路香烟桥警署的纠察队武器十分缺乏，没有枪，仅有大刀和土制炸弹。

这种土制炸弹来自大学生的发明，是把旧的香烟罐头利用起来，在里面塞炸药、石子和玻璃碎片。如果警署防范严密，纠察队仅靠这些简陋的武器

是攻不进去的，但是有些警署较为疏忽，香烟桥警署的警察平时都不带枪，长枪被统一锁在一起，等上司下达命令才能使用。

起义前，起义指挥部经过事先侦察，已经弄清了该警署的枪支究竟放在什么地方，由何人负责保管，以及房门钥匙由何人掌握。按照指挥部提供的情报，纠察队先扔了一阵土炸弹，把警察吓住，接着便直接冲进存放枪支的地方取枪。而后的事情对于纠察队而言就简单了，因为一旦枪支在手，占领警署乃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只是这样的成功仅局限于小范围，难以形成大的声势，更无法对起义军舰进行接应。祸不单行，起义军舰上所射出的炮弹又有几发落进了法租界，在法国海军的威逼下，军舰被迫撤离。

看到起义已无成功的可能，为避免损失过重，中共中央和江浙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起义。

面对两次起义都相继失败的事实，赵世炎等人并未气馁，他们认为两次起义尤其第二次起义实际上是一次必要的演习，“绝不是失败，更不是毫无结果”。它们给起义者提供的经验和教训，“超过了五卅（指五卅运动）以来所有的经验与教训之总和”。

一个月后，上海工人起义再次迎来了机会。张宗昌奉张作霖之命，派部将毕庶澄前来上海，接替原在上海的李宝章。

毕庶澄仅仅随身带来一个三千人的旅，既要对外抵御北伐军，又要在内防范工人武装起义，哪里摆布得开，更别说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军心严重不稳了。

实事求是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北伐军要通过进攻来占领上海并非没有把握，但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想兵不血刃地拿下上海，他派毕庶澄的同乡前去劝降，表示只要毕庶澄归顺国民政府，可以委任其为军长。

毕庶澄本无心投蒋，但他知道自己打不过北伐军，为了能够继续在上海这个繁华之地待下去，就投机了一把，对蒋介石送过来的乌纱帽未加拒绝。

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拒绝也就是接受了，或起码是在考虑接受，于是便向北伐军下令暂不进攻上海。

国民党不动手，共产党可就要动手了。因为有了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做得特别扎实。

中共中央和江浙区委共同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特委），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成员一共八人，除陈独秀外，其余七人都很年轻，其中罗亦农二十五岁，赵世炎和汪寿华二十六岁，周恩来算比较大了，也才二十九岁。

这些小伙子个个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他们往往白天开会，晚上决议，第二天就能将相应决定传达到执行者手中，效率非常之高。

我们现在缺什么

在特委下面，专设有宣传、军事两个委员会。前两次武装起义都被认为宣传不够，宣传委员会（特别宣委）专攻这一薄弱环节，他们针对上海本地不同阶层的民众，制定了不同的宣传口号和策略。

南下的鲁军使用军票，将军费分摊到普通市民身上，特别宣委就向一般市民和商人提出口号“反对鲁军使用军票”。两次武装起义都有工友死伤，特别宣委在对工人进行宣传时，便强调要“为死者报仇，建市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特别军委）以周恩来为主，赵世炎等人为辅。周恩来本身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书记，那个时候，中共有三种组织形式，分别是共青团、党委和军委，这三种组织形式可谓一层比一层严格，换句话说，中央军委在组织上比党团还要严密。凡军委成员一律不编入普通支部，原则上军委成员和他们的工作也都不会让普通党员知道，因此很多党员都对军委不太了解。

周恩来能够担任这么重要的组织的一把手，与其过往履历是分不开的。那年他与赵世炎等一同旅欧，回国后即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不仅熟悉军事，而且在黄埔学生乃至北伐军中也有较高的威望。

特别军委一成立，周恩来即从已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侯镜如，让他分管工人纠察队的训练。侯镜如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东征、北伐，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经验，在他的调教下，一段时间后，已经有一千八百名纠察队员可以较好地使用武器了。

毫无疑问，武器以及夺取武器在武装起义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可

是在第二次武装起义时，却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些工人虽然占领了警署，但也只不过是捣毁署内的家具而已，枪械连碰都没碰一下。

必须像攻占香烟桥警署那样组织起来，未来的起义才能取得成功。在周恩来、赵世炎的领导下，特别军委对上海八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实行了统一的编制和组织，工人集中的区均设立了纠察队总指挥部，下设大队、中队和小队，总指挥由特委统一指派，大队以下指挥则由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担任。

经过重新编组，以往纠察队中组织分散、指挥混乱的状况终于得到彻底改变。

第二次武装起义后，闸北工商界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征得上海驻军同意，建立了一种名为保卫团的武装组织。周恩来和赵世炎知道后，便分别动员一些未暴露身份的纠察队员加入。

有的纠察队员开始想不通，说保卫团是保卫资本家的，我们难道去保卫资本家？周恩来听了哈哈一笑，问他：“我们现在缺什么？”

队员回答缺枪支和弹药。

周恩来说，保卫团不但有枪支弹药，还有合法身份呢，纠察队打进去后，正好可以掩护军事训练以及其他起义准备工作。

有的队员虽然明知这是一计，但又认为自己是党员，加入保卫团会搞臭名声，日后被群众看不起。赵世炎耐心解释，告诉他们即便群众一时产生一些误会，日后也会得到澄清，“是铁是钢，时间和事实会给我们做证的，一时有些误会，对于革命者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经过动员，纠察队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保卫团，有人还当了班排长。他们白天公开参加训练，学习军事知识，晚上再把枪带回家，用于训练其余的纠察队员。

因为有了保卫团这层外衣，连起义准备阶段的武器搬运都变得方便多了。有一次，周恩来准备了两只皮箱，里面放的全是手枪、盒子炮和子弹。加入保卫团的纠察队员任其祥等人奉命带着这两只皮箱，乘一辆小汽车，从位于法租界的军委机关出发，送往指定地点。

任其祥等人都穿着保卫团的制服，外面罩一大褂。等汽车一离开法租界，进入华界，他们便马上把外面的大褂脱掉，露出制服。在路边站岗的警

察原想“抄靶子”（旧上海用语，即警察搜身），一看是保卫团的人，也就抬手放行了。

中途，小汽车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小汽车盯上了，而且一直紧随不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干脆将小汽车先直接开到保卫团团部。盯梢的汽车见状没了脾气，不得不快快离去。

当然保卫团的制服也不是万能的，而且有时情况紧急，制服也未必穿在身上，这时候就得靠点随机应变的能力和胆量了。

一天傍晚，任其祥雇了一辆汽车，准备将一箱武器送交共和新路的工人纠察队队部。路上突然遇到一位包探（旧上海租界的密探），拦着汽车要进行检查。

包探整天在上海滩的各个旮旯里转悠，方方面面的人都认识。他认出任其祥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便厉声喝问道：“你到啥地方去？”

任其祥非常冷静地回答：“到车站！”随后指了指箱子说：“你要不要看？这是一箱手榴弹。”

包探不知真假，反倒戾了，忙说：“好，你走吧。”

实际上，任其祥当时已握紧了衣袋里藏着的手枪，准备万不得已就给他来一下子。

汽车接着开到共和新路的弄堂口，发现有两个警察站在那里。任其祥疑心是队部出了问题，但此时他已经下车，不好再走，于是只得硬着头皮走进弄口。

到了队部门口，任其祥用暗号敲了敲门，幸好开门的是自己人，证明队部并未被发现或遭到破坏。

箱子还在车上，但警察仍在弄口看着。有人建议再坐汽车到街上兜一圈，等警察走后再抬箱子，可问题是马上要戒严了，汽车没法在街上兜风。

没有其他办法，大家把牙一咬，当着警察的面，大着胆子把箱子抬进了队部。奇怪的是，警察居然熟视无睹，就像没看到一样，大概他们也预感到暴风雨将至，不愿再继续招恨惹怒了。